

1902年 中英订立试办禁烟条约

1902年 11月 11日，中英订立试办禁烟条约，定 1905年禁绝。自咸丰朝、同治朝以来，中国迭经外患，于是朝野人士开始渐改鄙弃外夷的观念，而欲仿效西方长技，厉行新政以自强。而禁绝鸦片则是这样的新政措施之一。1892年，户部奏请严定分年禁烟办法，1895年，驻华外国传教士联名请愿，请求禁烟，同年 12月，清政府颁布禁烟谕旨。外务部也屡次与英国公使交涉，请求禁绝烟土进口。是日，中英议定《禁烟条约》条款，主要内容如下：（一）印度洋药以运往各国之全数为限制，以印度出口 200万箱为定额，按年递减 20万箱，从 1902年始，1905年减尽；（二）派员前往印度加尔各答监视拍卖打包；（三）洋药税厘征收加倍；（四）香港所熬烟膏禁运中国境内；（五）各口岸租界内禁止烟馆及吸烟处所，不得售卖烟具；（六）禁止任意运入吗啡及吗啡针。中英双方声明，该条约试行三年，期满后，如果中国禁烟有成效，栽种及吸食确实减少，双方再议续约。

圆遥向英德借钱修津浦铁路

为修筑天津至浦口铁路，清政府先后两次与英、德借款。

员圆年 员月 员日由署外务部右侍郎梁敦彦与上海德华银行及伦敦华中铁路有限公司代表在北京订立第一次借款合同。共 圆款，借款额为 缘万英镑，年息 缘厘，九三折实付，猿年为期，以直隶、山东、江宁、江苏淮安厘税每年 猿万两作保。并须聘用英、德总工程师各一人，债权 员万有代购外洋材料和优先续借新款等权利。在全国收回路权斗争的影响下，合同将原拟请英、德代筑的津浦铁路借款草合同改为中国借债自修，挽回了部分利权。根据合同于 员年后中国可将借款全数还清的规定，张之洞、袁世凯等奏准 员年后官商分任还债，改为官商合办。此议直接推动了直隶、山东、江苏、安徽四省的预筹津浦铁路招股活动。

由于借款不敷开支，员年 怨月 圆日，清政府津浦铁路督办大臣徐世昌、帮办大臣沈云沛与德国德华银行代表柯士达、英国伦敦华中铁路公司代表梅尔思，在北京订立《天津浦口铁路续借款合同》（共 圆款）。并附《津浦铁路续借款分期摊还本利表》。

该合同的主要内容有：员援中国准英德公司办 缘厘利息英镑借款，总额为 源万英镑。名为：中国国家天津浦口铁路 缘厘利息续借款。圆援借款宗旨是：作为续备建造官办铁路之资

本。其路线由天津（或天津附近）接连京奉铁路，经德州、济南至山东南部的峰县，然后经过峰县至浦口。峰县以北为津浦北段，以南为南段，全长 104 英里。该项借款用于建造铁路、购办地段、车辆及一切应配物料，并经营行车，以及付还借款利息。借期与还本付息：该借款以 10 年为期；还本付息每半年 1 次，由铁路进款或其他合宜进款交付；如中国于 10 年以内提前还本，每 100 英镑加价 1 英镑。还本付息以德华银行、汇丰银行为限，并每 100 两须付 1 钱 5 分小费。担保：以山东、安徽、江苏三省每年关平银 100 万两，税厘所有余款作为第 1 次抵押；或另以直隶省厘税每年关平银 100 万两，山东省厘税每年关平银 100 万两，江宁厘金局厘税年关平银 100 万两，江苏省淮安关厘税 100 万两，安徽省厘税 100 万两为预备抵押。发行债券：该项借款由英德公司印成债券发行，数量由公司酌定，在伦敦办理；中国允准及承认发售此项债券；所有债券及票息，在借款期内，不纳中国各样厘税，即予以免税；债券可在欧洲或中国出售，公司于每 100 英镑中扣留 1 英镑半小费。管理：津浦路建设工程及一切管理权归中国办理；建造南北路段，中国得聘请英、德总工程师各 1 人；铁路上派用或辞退专门人员，铁路总办或代办得与该段总工程师商酌办理。购料：建造该路如需购买外国材料、机器什物，只能由德华银行、华中铁路有限公司办理；并每 100 两加银 1 两，作为订购材料及支取费用。支路：中国如需要借款修建津浦路支线，得优先同英德公司商办。

通过铁路借款，英、德两强从中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并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津浦路权。

猿山西收回矿权

山西矿藏（特别是煤矿）的丰富，在全国向居前列，久为帝国主义列强所垂涎。光緒二十九年 閏月 閏日，清廷同英国控制的福公司签订了《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二十条，规定将孟县、平定州、潞安、泽州与平阳府所属煤铁以及他处煤、油各矿，“转请福公司办理，限 迺年为期”。但因山西对外的运输问题存在很大困难，一时尚未着手。光緒二十九年 閏月 怨日，山西绅商组成山西同济矿务公司，由董崇仁、孙笥经、梁善济等任创办人，制定开办章程十四条，规定“先行推广开采煤炭，次第举办五金煤油各矿”；“创办之初拟先用土法开采”，“俟有成效，再用大机器开采”；并特别强调：“不招外洋股份，不用外省人员。”

这时，英国福公司也派遣矿师萨福礼、萧密德前往平定州、孟县勘察，发现当地正在自行开挖煤井，彼此间发生冲突。于是，福公司就蛮横地向清政府要求专办权，声言非经福公司同意，无论何人、何公司都不准在该处开采煤矿；并且要求禁止中国人在平定州、孟县、潞安、泽州及平阳府属各地办矿。这就更加激起了山西人民的愤怒。

翰林院庶吉士解荣辂、梁善济，知县崔廷献、举人刘懋赏等猿人（解、刘两人在山西争矿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久都参加了同盟会）联名公禀山西巡抚张曾敷，指责原订办

矿合同丧失利权，要求加以撤废。山西大学堂和山西武备、师范、商矿、警务、农林等学堂学生¹⁹⁰⁵源人也联名具禀，认为此事是“身家性命之关键，种族存灭之枢机”，要求“议废合同，合力自办”。他们又公呈外务部，提出价赎山西矿权的主张。¹⁹⁰⁵年¹¹月¹⁵日，留日学生总会也具禀外务部，陈述福公司要求专办权的无理和撤废原订合同的理由。山西、河南、陕西三省留日学生也联名致电外务部，请求主持废约。

这年¹²月¹⁵日，山西留日学生李培仁因愤于清政府的卖矿活动而蹈海自杀。他在绝命书中说：“我非甘死好死，我实不忍见彼紫髯绿睛之辈之怀我利权，制我死命也。”“政府官吏既实行亡我矿产，则命脉断，而我同胞有必死之势。”“我同胞尚势如散沙，形同昏梦，不急拚命救死，舍死求生，以背城一战乎？”他并呼吁道：“政府如放弃保护责任，晋人即可停止纳税义务。约一日不废，税一日不纳，万众一心，我晋人应有之权力也。”¹²月¹⁸日，山西留日学生举行追悼会。“越三日，复开晋豫秦陇全体追悼会，莅会者数千人，哀辞挽联，布满四壁。”例如山西籍同盟会会员王用宾的哀辞（调寄满江红）是：

“碧睛紫髯，叹底事强权至此。最可痛，开门揖盗，罪不容死。按剑未销荆轲恨，捐躯誓蹈鲁连志。顾河山黯黯暮阳红，无生气。争不得赂秦计，忍不住和戎耻，想背城一战，身殉而已。遗珠完璧归何日，血雨腥风葬无地。好头颅掷向蛟龙窟，等闲事。”

会上并决定由王用宾和另一个同盟会会员景定成（梅九）等护送李培仁烈士的灵柩回国。运回太原后，又召开追悼会，到会的有数千人，群情激愤。

接着，山西同济矿务公司改组，于同年冬创设保晋矿务公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司。公举进士出身、曾任内阁中书的祁县富商渠本翘为总理；先在平定州、孟县、潞安、泽州各地试开煤井数十处。阳曲绅商组织曲东煤矿公司，拟自外国购办吸水机器，开采煤矿。全省商务局总办刘笃敬集资开办阳曲王封山磺矿。平陆县绅商狄楼海等集资创设平陆矿务公司，开办全县各处煤、铅、水晶、石膏各矿。还公举刘懋赏、李廷颺作为全省绅民代表前往北京，同福公司作废约的直接谈判。

但同福公司的谈判长期陷于僵持局面。山西各界人民又进一步采取行动，到处聚众演说。1906年10月，平定州两次召开大会，宣传抵制福公司，“惟有禁止矿地私售一法”。太原等处绅民并决定：“如福公司执迷不悟，强行开采，则有矿地之家，不准售地；附近之人，不得为之作工；附近之民，不得与之贸易。有违此者，相与惩办，驱逐出籍。”11月1日，山西学、商各界在太原举行大会，到会的有万余人。同蒲铁路总办何福诗和翰林院庶吉士解荣等先后演说，“誓以坚持废约，实行自办为宗旨”，会上并决议撤废福公司原订办矿章程，绝不让步余地。山西京官也由署邮传部尚书李殿林领衔，联名上疏，力请废约。

由于山西人民用实际行动强硬反对，而英国在欧洲同德国的对峙日趋紧张，无力东顾，经过一个多月多的谈判，终于在1906年11月1日，由山西矿务局总办刘笃敬同福公司代表梁恪思签订了《赎回山西孟县、平定州、潞安、泽州与平阳府开矿制铁转运正续各章程合同之合同》，以100万两的代价，将福公司在山西攫得的矿权全部收回。这是收回利权运动中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源瑶滇民拒外

1905年1月14日，驻京法使巴思德照会清外务部，法商临安公司在云南采矿受阻，请予查究。云南省人民生活向来极为贫困，而民性也极为强悍。滇民以开矿谋生的很多，矿产收入向来是云南省财政的重要源泉。1905年云南教案的发生致使法商隆兴取得滇省矿权。因此云南省绅民对于隆兴公司分设的临安公司开采滇矿，极抱恶感。1905年临安革命党人周云祥率众起义，以拒外相号召，滇南民众参加者很多。是年7月14日，云南士绅激愤外侮交侵，而清政府保境无方，因而设立“云南死绝会”，作为野蛮对付敌人的一种手段。为避免发生激烈暴动，云南省官吏尽量迎合绅民收回矿权的意愿，以收揽民心。此时正好有法商临安矿务公司私购境内闲姓矿地一案，并未报明地方官完纳契税，蒙自关道因而饬拿闲氏父子，并发布告示，禁止乡民将矿地私售法商。是日，驻京法使巴思德照会清外务部，请将闲氏父子开释，并保护法商临安公司能顺利开采矿石。

缘葡萄牙国王遇刺

20世纪末，葡萄牙国内政治斗争日趋尖锐，共和主义在葡萄牙不断发展，1976年路易斯国王去世后，其子卡洛斯继承王位。新即位的卡洛斯国王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挽救国内的危急局势，相反却日益挥霍。1976年卡洛斯一世任命若奥·佛朗哥为内阁首脑，妄图通过佛朗哥的独裁统治维持濒于解体的君主政体，但遭到共和党人和国内民众的反对。1976年10月1日，卡洛斯一世全家从旧居维索扎城回到里斯本，激进分子在王宫广场刺杀了卡洛斯一世及其王储。卡洛斯的次子曼努埃尔二世继承了王位。

1905年 趵遥清水师拘留日商船

1905年圆月初，日本商船“第二辰丸”因无护照载运军火，在澳门附近的九洲洋面被清政府水师拘留。清朝统治者刚受过同盟会领导的钦州防城之役和镇南关之役等打击，怕走私军火为国内反清力量所得，因而采取这个行动；日本则要利用一切机会，在中国树立其不可触动的威势，于是抓住这件事立即提出抗议，指责中国水师的行动为“违约”、“狂暴”、“野蛮”等等。清政府表示退让，提出“先将‘第二辰丸’释放，另行具结候查”等解决办法，接着又正式向日本道歉。日本不甘罢休，提出五条要求：将该船立即无条件释放；在释放时，中国应派兵舰到该船停泊处升炮致歉，“并先期知照日本国领事阅视实行”；中国备价将该船上军火收买；处分有关官员；赔偿该船损失。这期间，日方一面散布“遣舰赴粤夺还该船”的空气，一面直接向清政府实行恐吓，一再声称将“下适当之手段”。

对此清政府决定征求英国的意见。猿月圆日，清外务部致电两广总督张人骏，转陈总税务司赫德，条约处置捕获日轮“第二辰丸”号办法。但赫德认为中国海关无权扣船动货，主动释还船只，并鸣炮向日旗致敬，或赔偿业主。他在节略中指出：（一）“第二辰丸”号非海关所缉获；（二）所有出入澳门洋旗船只，拱北关全无牵涉；（三）该船系被地方官缉获；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四) 洋旗船只非遇灾险，不准驶往不通商口岸；(五) 洋旗船只必须经过中国海面，于经过时因候潮涨落及天气不和以及另有他故，或须停泊。(六) 无论何船如此停泊，中国官员有权上船查系所为何事；(七) 惟如此上船详查，中国官员必须认明实在情形；(八) 即如澳门系属外国口岸，该处报进报出各船往往在尽附澳门口外停泊，确系实情；所有如此停泊之船，无论何官上船必须认该船必须停泊之故，并系照例应停；(九) 又澳门既居洋界地位，则澳门前列之海面即为通行之海、并非中国之水面；(十) 以“第二辰丸”而论，有运往澳门之货，此货无论何物及如何由船起运澳岸，所挂之日本国旗及指运之澳门洋界均得保护所运物品，拱北关于起运上岸时丝毫不得干涉；(十一) 此次货物系属军火，全无异言，已自承认；应指明澳门官宪只准领有执照的商户贩运军火，以防弊端；(十二) 该船在口外停泊，并不足为启人疑惑上船缉获的实据，且该船所装军火既属例应载运，中国官员也无扣船动货之权；(十三) 此案所获船货，既在尽附洋界口外，将次遵照此口之章，并奉有巡捕保护起货，则无论南洋澳门一带贩运军火如何启人猜疑，总不足为缉获此船的实据。(十四) 日本官员视中国此举毫无根据，现所查悉的各情事，都足以表明日本未失常；(十五) 至于双方会审一节，非经两面允认不可；而日本已声明不允；(十六) 纵或会审，亦不能更动现所知悉情事，而此情事实不足为应行缉获或扣留的佐证；(十七) 似此例章与情事均足辅助彼面，谅日人自将要索放还扣留之船，且大约亦索扣留的赔偿费，况有撤旗情事，更至不易了结的地位。赫德声称，此事最妙由外务部与日本大臣和洽商订，妥善办法，如果和平商办并认此次误扣之咨，则释还船只，并鸣炮敬日

旗，或暗偿业主亦非有伤体面，此事最易最省，则立即如此办理为要。清外务部将赫德的条议转陈给张人骏。

猿月 员猿日，驻京日使林权助为“第二辰丸”案向清外务部提出 纒项要求：道歉、赔款、惩官、释船、收买被扣军械。日使向外务部提出的照会大要如下：（一）中国政府对撤换日本国旗一事，应派兵舰升炮以表歉扰；（二）中国政府应即时将“第二辰丸”放行，不得立有条件；（三）中国政府应备日元 圆肆元收买“第二辰丸”运载的军火；（四）中国政府应声明俟查扣留“第二辰丸”实情，将担其责的官员自行处置；（五）中国政府应赔偿帝国政府扣留“第二辰丸”所发生的损失。清政府在日本的威胁下，于猿月中彻底屈服。在这一事件中，日本专横恣肆，蛮不讲理，表现得淋漓尽致，因而激起中国社会各界的极大愤慨。就在中国军舰被迫鸣炮二十一响向“第二辰丸”致歉时，广东爆发了抵制日货以示抗议的爱国运动，而且这个浪潮很快就扩及内地各处以及香港和南洋等地的华侨中。中国举国上下，从日本在东三省的种种侵袭及其在整个对华关系上威逼狂虐的事实中，深切地感受到日本正迅速成为侵略压迫中国的主要角色。

魏 摇 《结社集会律》 颁布

清朝末年，长期坚持进行的农民反清斗争与刚刚兴起的民族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斗争联合起来。农民组织的反清秘密结社，如天地会、哥老会等十分活跃；与此同时，资产阶级也逐渐形成了一系列革命团体或政党，如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岳王会、同盟会等等。这些组织或独立，或联合，或秘密，或公开、半公开地同清王朝进行殊死的斗争，形成了比较广泛的社会运动。面对农民斗争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猛烈冲击，清政府感到十分恐慌。他们认识到，单纯依靠军事镇压的手段，已无法维持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因此，一些人提出向东西资本主义国家学习，通过法律手段和警察力量，逐渐削弱乃至消灭反清政治组织。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一名官员上书指出：“中国会党林立，康梁而后，流毒弥深，传染学界。无知学生，好异思奇，放纵忤逆。初涉学校，争言平等、自由；甫经出洋，喧嚷革命排满，逆节悖理，无父无君，而巡警视为分外之事则非也！泰西如党会在二十人以上得该管官允诺方行，如有公家之事集会，亦必报管理公署，而警察窥伺于其前，探听于其间，审察于其后，所以无浸淫恣肆之扰攘，皆警官严密审问之周备也此即宜昭定限制，严立章程，以阻其谋维不轨之心”这个建议后来可能受到了清政府的重视。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魏 摇

年 閏月 閏日），清廷根据那拉氏的懿旨颁发了一道上谕，其中说：“惟各国君主立宪政体，率皆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而施行庶政，裁决舆论，仍自朝廷主之。民间集会结社暨一切言论著作，莫不有法律为之范围。各国从无以破坏纲纪、干犯名义为立宪者。况中国从来敦崇礼让，名分严谨，采列邦之法规，仍须存本国之礼教。朝廷预备立宪，期望甚殷，乃近岁各省绅商士庶，其循分达理者固不乏人，其间亦颇有浮躁蒙昧、不晓事体者，遇有内外政事，辄藉口立宪相率干预，一唱百和，肆意簧鼓，以讹传讹，浸寻日久，深恐谬说蜂起，淆乱黑白，下陵上替，纲纪荡然。宪政初基，因之阻碍，治安大局，转滋扰攘，立宪更将无期，自强之机，更复何望？盖民情固不可不达，民气断不可使嚣。立宪国之臣民，皆须遵守秩序，保守和平除报律已飭法部、民政部妥速拟订外，著宪政编查馆同民政部并将关于政事结社条规，斟酌中外，妥拟限制，迅速奏请颁行，倘有好事之徒，纠集煽惑，搆酿钜患，国法具在，断难姑容，必宜从严查办。”这道上谕，事实上表明了清廷制定《结社集会律》的宗旨。紧接着，清廷又连续发布两道上谕，使上面的宗旨表达得更为明确。同月二十一日（即前道上谕发布的次日），清廷又发布一道上谕，指出：“……奖励之途甚优，警戒之法亦甚备，如不准干预国家政治及离经叛道、联盟纠众、立会演说等事，均经悬为厉禁……乃比年以来，士风颇见浇漓国家要政，任意要求，动辄捏写学堂全体空名，电达枢部，不考事理，肆口诋□，以致无知愚民随声附和，奸徒游匪，藉端煽惑，大为世道人心之害。”次日（二十二）日，清廷又发布一道谕旨，指出：“京师辇毂之下，近闻有聚众开会、演说等事，殊属不成事体，流弊甚多，著民政部、步军统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领衙门、顺天府一体严行查禁。”

显然，以上三道上谕就是清朝立法机关制定《结社集会律》的重要依据。在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对于集会、结社问题的态度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一些明达的官员反对对集会、结社采取一概排斥的政策。就在上述三道谕旨下达几天以后，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907~~年 12月 1日），御史赵炳麟上奏帝后，指出：“开会结社未可一概禁止。臣考我朝名臣，远如汤斌，近如曾国藩，亦皆立会讲学蔚为良辅。日本大隈重信，持其所学，教授生徒八千余人，在早稻田研究政治，日本国家大受其益。宋明末造，严禁讲学，卒以钩党亡其国。方今时局艰难，正赖京外士民同德同心，讲求政学，若不分别办理，一概禁止，实非治平之道矣。应请飭下宪政编查馆，会同学部、法部、农工商部、民政部，妥议章程，凡研究政治、法律、农商、教育等会，必报部立案，一经核定，国家力任保护，其妨碍治安、不守法律所规定者即行查禁，似此分别办理，庶合朝廷预备立宪之至意。”在此前后，还有一些官员上书呼吁政府开放党禁，并要求当局对学生的爱国激情采取宽容的态度。应当承认，在朝廷制定《结社集会律》时，后一种意见也被部分地采纳了。

《结社集会律》奉旨颁布于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九日（~~1908~~年 2月 1日），共三十五条。根据律文的内容，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条至第二条关于结社、集会的定义。该律规定：“本律称结社者，凡以一定之宗旨合众联结公会，经久存立者皆是；结社关于政治者，称政事结社。”“本律称集会者，凡以一定之宗旨临时集众，开会演讲者皆是；集会关于政治者，称

政论集会。”立法者解释说：“故自学术、艺事、宗教、实业、公益、善举推而至于政治，无不可以稽合众长，研求至理。经久设立则为结社，临时讲演则为集会。”

第三条至第二十二条关于结社、集会的条件、程序；官方管理、监督、取缔结社、集会的条件和程序。该律第二十一条规定：“凡秘密结社一律禁止。”立法者特别指出：“各省会党，显于例禁，均属秘密结社，仍照刑律严行惩办。”一般性的政治结社“非呈报有案，不得设立”。但“与政治及公事无关者，皆可照常设立，毋庸呈报”。至于“关系公事者，虽不必一一呈报，而官吏谕令呈报者，亦当遵照办理。”可见，该律对于政治结社限制极严。

（三）第三十三条及附则二条，规定了该律的诉讼期限，生效日期及该律施行前，已设立的政事结社“必须于一个月内呈报”等等问题。

愿越南人抗税

在北圻地区越南人民以东京义塾为中心开展爱国运动的同时，中圻也迅速掀起了一个反对贪官污吏，提倡剪短发，穿短衣，使用国货，废除陋习，注重实业，兴办学校的运动，被称之为维新运动或同胞运动。

进步士大夫们宣传鼓动的目的，在于激励爱国热忱，企图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进行改革。他们提倡剪短发，是向儒家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旧观念宣战。

中圻的进步士大夫们还鼓动振兴实业，而且身体力行，办起了一些新的企业，使民族工商业得到发展。同时，也像北圻的东京义塾一样，在中圻掀起了办学热潮。这些学校以使用国语字为主，讲授历史、地理、格致、卫生等新学。还教学生歌咏和体操，校际之间举行会考。每周举行演说会，学生可以自由上台演说。演说活动扩展到校外，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当时中圻维新运动的领导者是潘周桢、陈季玲、黄叔抗、范德言、黎文勋、阮廷坚等人。潘周桢、黄叔抗等主张采用和平手段，而范德言等人主张暴动，政见不尽相同。但他们能够互相帮助，把持不同政见和不同倾向的派别，都汇合到维新运动中来。

在殖民统治下，苛捐杂税和徭役是套在农民身上的两副沉重枷锁。中圻农民平均每年服役达 15 次之多，不仅经常

因此误了农时，而且要遭受监工的毒打谩骂。农民中蕴藏着强烈的不满。因此，当维新运动进一步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的时候，便发展成为一场剧烈的社会风暴。从竞相剪短发、穿短衣、衣服用国产土布，到有的地方发生了剪行人长衣摆、打断官吏牙牌的事件。特别是1905年圆月底反映了群众要求的“不向法国殖民者纳税”的口号广泛传播开来，运动迅速发展成农民反抗法国殖民者及其走狗封建官吏的激烈斗争。

1905年猿月员日，广南省大禄县爆发了人民群众在会安法国公使馆门前的游行示威，抗议摊派徭役。法国公使逮捕群众代表，野蛮殴打群众，更激起了群众的义愤，参加游行者不断增加，多达员万余人。斗争的口号也从要求减少徭役时间到要求废除当伏条例和减税。他们的斗争坚持员个多月，并得到市民的支持。会安的许多商店关门，使商业陷于停顿。统治者被迫答应不再加税，但运动仍在不断高涨，群众向他们痛恨的贪官污吏兴师问罪。猿月圆日，群众包围了广南总督胡得忠的官邸，强迫他向法国殖民者提出减税要求。猿月圆日和圆日，示威群众先后包围了奠边府和三歧府官府，抓走知府。源月苑日，维川县的群众包围罪大恶极的区长陈括的住宅，把陈括绑到河边处死。其他地方的一些群众也乘机向越奸讨还血债，运动迅速向邻近各省蔓延。

猿月底，运动扩展到广义省。源月初，扩展到与广义相邻的平定省以及承天省。缘月，蔓延到富安和河静省。各地都举行了反抗拉伏和要求减税的大规模游行。游行者抓走官吏，惩办越奸，有的地方甚至发展成为夺取政权的暴动，打死县长，农民俨然做了农村的主人，地方官纷纷逃入省城。除了上述省区外，像川安、清化、平顺、庆和、广平、广治等省的许多市